

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

——批林批孔资料选编

第一辑

兰州大学图书馆

一九七四年二月



目 录

林彪再三挥舞“克己复礼”黑旗居心何在？	
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大批判组……………	(1)
孔子是怎样利用教育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？	
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大批判组……………	(7)
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	倪隽、李溪魁……………
	(18)
林彪是现代中国的孔子	李文波整理……………
	(41)
名词解释……………	(64)
克己复礼……………	(64)
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……………	(65)
天马行空 独往独来……………	(66)
名不正言不顺……………	(67)
韦编三绝……………	(68)
“在人主不骄故也”……………	(68)
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”……………	(69)
“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 勇也”……………	(70)
“勉从虎穴暂栖身”……………	(71)
“韬讳”和“胸有大志、腹有良谋”……………	(72)
范 蠡……………	(73)
周文 齐桓……………	(74)
各领风骚数百年……………	(74)
董仲舒……………	(75)

天马行空 猛志常在…………… (76)

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，故曰忠厚之至也…………… (77)

朱 熹…………… (77)

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…………… (78)

06
65

林彪再三挥舞“克己复礼”黑旗 居心何在？

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大批判组

一九六九年，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，我们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会上发出了“团结起来，争取更大的胜利”的号召。在九届一中全会上，毛主席进一步指出：“团结起来，为了一个目标，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”。在九大路线的指引下，全党、全军和全国人民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。

但是，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失败的。在刘少奇叛徒集团垮台后，林彪反党集团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，千方百计地破坏九大的革命路线，疯狂地加紧进行反党阴谋活动，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。

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、两面派、叛徒、卖国贼林彪，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，把孔孟之道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。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，林彪躲在阴暗角落里引用《论语》中“克己复礼”，连续写了两条字句相同的条幅赠给他的死党：

“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”

他的死党心领神会，于十月二十三日以同样的字句也写了一条回敬主子林彪，表示反革命决心。一九七〇年元旦，

正当全国人民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，乘胜前进，以战斗的姿态跨入伟大的七十年代的时候，林彪生怕他的死党对其反革命用心领会不透，第三次写下了内容同上的条幅：

“悠悠万事，唯此、唯此为大。克己复礼。”

请注意，林彪在这里连续用了两个“唯此”，这决不是多余的重复，而是别有用心的强调。

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，林彪一伙接二连三地写下了以上条幅，把“克己复礼”当作万事中最大的事。他们“克己复礼”的反革命心情是多么急不可耐，又是多么丧心病狂啊！

孔子的“克己复礼”究竟是什么货色？林彪一伙如此狂热鼓吹“克己复礼”又居心何在？他们究竟要复什么礼？到底要干什么？

“克己复礼”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政治纲领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。当时天下大乱，奴隶制的旧秩序——礼制处在全面崩溃之中，新兴封建制度日益成长壮大。面对着这种形势，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，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，孔子提出了“克己复礼”的反动口号。所谓“克己”，就是要人们按照反映奴隶主阶级根本利益的“周礼”，去克制自己的欲望，约束自己的行动。在当时主要是要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奴隶无条件地忠于奴隶主，不要“犯上作乱”，不要造他们的反。“克己”的目的是为了“复礼”。所谓“复礼”，就是要恢复已经崩溃了的西周奴隶制的统治的秩序，即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。由此可见，孔子的“克己复礼”，反映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不甘心灭亡、要与新兴势力作拚死斗争的反动意志，完全是一个反对社会变革，妄图倒转历史车轮、复辟西

周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。

鲁迅在揭露反动派的复古活动时指出：“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，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”（《集外集拾遗·关于知识阶级》），他们“明明是现代人，吸着现在的空气，却偏要勒派腐朽的名教，僵死的语言，侮蔑尽现在”（《热风·随感录五十七·现在的屠杀者》）。林彪反党集团就是这样一伙反革命顽固派。他们抬出孔子这具政治僵尸，继承孔子的衣钵，把“克己复礼”奉若神明，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、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。

当然，林彪和孔子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，他们鼓吹“克己复礼”的阶级内容也不相同。孔子是在我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时期，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，妄图复奴隶制的“礼”；林彪是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，代表被推翻的地主、资产阶级，妄图复资本主义的“礼”。但是，林彪和孔子在反对社会变革、主张倒退，搞反革命复辟这个根本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。在孔子“克己复礼”的黑旗下，映出了林彪反革命的狰狞面目；在林彪“克己复礼”的阴谋活动中，游荡着孔子的阴魂。

孔子的“复礼”，是推行一条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的反革命路线，就是要复兴灭亡的奴隶制国家，恢复奴隶主贵族的世袭权力，让那些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遗老遗少们死灰复燃，继续残酷地压榨奴隶。林彪的“复礼”，是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，就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，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。林彪一伙所以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日间再三抛出“克己复礼”

的反动口号，就是为了动员其死党加紧抢班夺权，发动反革命政变，实现这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。

为了实现“复礼”的迷梦，林彪朝思暮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。他从搞复辟的祖师爷孔子那里，找来“正名”的破烂武器。一九七〇年五月，他猖狂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，指使其死党向党进攻，叫嚣他要当“国家的头”，“国家没有一个头，名不正言不顺，林彪反党集团公然以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”的说教为根据，顽固地坚持反党的政治纲领，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。说穿了，他林彪不当“国家的头”，就名不正；名不正，就指挥不灵；指挥不灵，就“复”不了“礼”，复辟资本主义的“事”，就搞不成。在林彪一伙的心目中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切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大好形势和新生事物，都不符合他的“礼”。他们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革“中国人民”的命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“独裁”，狂叫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“逸民”，即蒋家王朝的残渣余孽、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、叛徒、特务、死不悔改的走资派“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”，以便扶植反革命的复辟势力。在阶级社会里，对一个阶级的解放，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。林彪要解放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，就是要我国亿万劳动人民重新推入苦难的深渊，就要有千百万人头落地。十分清楚，林彪的“复礼”，对内就是妄图恢复被无产阶级打破的旧秩序，恢复剥削阶级失去的“天堂”，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。

毛主席指出：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，没有后台老板，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”。林彪为了实

现“复礼”的迷梦，必然要找一个帝国主义洋大人作为自己的后台老板。这个后台老板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。当他们的阴谋败露后，又仓皇出逃，投奔苏修，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。这些事实充分表明，林彪的“复礼”，对外就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，充当苏修“核保护伞”下的儿皇帝。

总之，林彪的“复礼”，就是要恢复地主、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制度，恢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，变中国为苏修的殖民地，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的专政。

至于林彪鼓吹的“克己”，和孔子一样，也是为了实现“复礼”。他要求其死党把“复礼”作为头等大事，按照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“礼”来约束自己的一切言论行动；还告诫他们，不要过早暴露，因小失“大”，要克制自己，“注意荫蔽”，“遵守纪律”，一切服从于“复礼”，象胡风反革命集团那样，“在忍受中求得重生”，等待时机，以求一逞。

林彪乞求于孔子的亡灵，袭用孔子“克己复礼”的反革命纲领，这决不是偶然的。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，由于他的思想实质是复古、守旧、倒退和复辟，反映了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利益，适应他们的政治需要，所以，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的。孔子的“克己复礼”，也就成为他们反对革新、镇压人民的思想武器。

宋代反动的儒家代表人物朱熹在《延和奏札》中，向封建皇帝献计献策，说什么孔子的“克己复礼”，是“千圣相传心法之要”，“天理之全”，以此作为维护反动统治的法宝。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曾国藩声称：“先王之道，所谓修己治人，经纬万汇者，何归乎？亦曰：礼而已矣。”

（《圣哲画像记》《曾文正公文集》卷二第五页）他把“克

己复礼”看成是支配万事万物的根本信条，鼓动他的大小喽罗“克己而爱人”，“浩然捐生”，为“戡大乱”即镇压人民革命而卖命。独夫民贼蒋介石也把孔子的“克己复礼”奉为至宝，明确地订在国民党《党政工作人员须知》的手册中，作为训练法西斯党徒、反共反人民“基本教育”的一个重要准则。他把“礼”看作是“精神的国防”、“立国纲维”，梦想通过“重礼”来“奠定”蒋家王朝“千万年的精神基础”。和历史上没落的各种剥削阶级代表人物一样，林彪为了篡党复辟，竭力鼓吹孔子的“克己复礼”，这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。

两千多年前的孔子，以“克己复礼”为复辟纲领，为恢复西周奴隶制奔走呼号了一生。今天的叛徒、卖国贼林彪跟在孔子的屁股后面，挥舞“克己复礼”的黑旗，为复辟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进行拚死的较量。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，不仅思想象孔子的，语言也有很多是搬用孔子的。如果九泉之下的孔老二，知道两千四百年后还有象林彪这样的“超级”信徒，一定会喜出望外，得意忘形地说：真吾徒也，“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林彪和孔子在思想体系上一脉相承，息息相通；在政治上都是搞复辟、开倒车、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。毛主席说：“**凡属倒退行为，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。古今中外，没有例外。**”孔子的倒行逆施，没能挽救奴隶制度的灭亡，结果成了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，带着复辟奴隶制的花岗岩脑袋见周公去了；林彪复辟资本主义、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的迷梦，不但没有实现，反而落得死无葬身之地，扛着“克己复礼”的破旗朝拜孔老二去了。这是一切复辟势力的必然结局。

（人民日报1974年1月29日）

孔子是怎样利用教育 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？

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大批判组

孔子是春秋末期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。他一生都在维护正在崩溃的奴隶制度。他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办教育。

历代反动统治者把孔子吹捧成“至圣先师”、“万世师表”。林彪一伙甚至公然叫嚷：要“大书特书”孔子在教育史的“划时代的功绩”。

孔子办教育的历史本来面目究竟怎样？我们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，用马列主义观点加以剖析。这对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，是很有必要的。

为奴隶主服务的“私学”

过去，有的人因孔子办私学，吹捧他是我国历史上打破“学在官府”的传统，“把学问从贵族手里拿到平民手里的一位大师。从那时候起，中国的教育已经掌握到平民手里了”。把孔子说成好象是一个“进步的大教育家”。这是对历史的歪曲。

孔子所处的时代，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的时期。当时，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，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。与此相适应，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专为奴隶主贵族官僚子弟开设的官办教育——“官学”，妨

碍了新兴地主阶级掌握文化和从事政治活动。同时，社会上主张变革的新思潮也波及“官学”内部，引起了奴隶主当权派的恐惧，有的人提出了“可以无学，无学不害”的主张（《左传》昭公十八年），甚至有“毁乡校”的议论（《左传》襄公三十一年）。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奴隶起义的不断冲击下，“官学”就再也难于维持下去了。

随着“官学”的日趋衰落，私家收徒讲学日渐兴起。与孔子同时期办私学的，有郑国的邓析、鲁国的少正卯等。少正卯宣讲的是革新思想，吸引了大批学生，甚至孔子的弟子也离开孔子而“归少正卯”，以致“孔子之门，三盈三虚”（王充：《论衡·讲瑞》）。

这些史实说明，官学并非孔子“打破”，而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
在阶级社会里，一切教育“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，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。”（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）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，都有鲜明的阶级性。孔子办学和少正卯办学，虽同为私学，却属于不同的阶级和政治路线，有着不同的目的和内容。因此，离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，离开教育为哪一个阶级服务，用“官办”还是“民办”来评价办学是反动还是进步，这是十分荒唐的。

孔子所办的私学，是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服务的。在腐朽的官学制度已经不能抵挡新思潮的进攻，私学兴起已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，孔子以奴隶主阶级卫道士的姿态，也用办私学的方式，把奴隶主阶级官学的反动使命接了过来。他收罗门徒，培植势力，利用讲坛，制造舆论，妄图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，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统治，扶植那些

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上台，即所谓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）。他办的私学，从招收学生的阶级路线到教育的政治思想内容，同过去的官学并无实质上的区别。这分明是拉着历史的倒退，哪有什么进步意义？！

如果认为，孔子办私学，改变了文化教育由少数贵族官僚子弟垄断的局面，使之“扩大”到了没落的贵族，也算是一个“进步”，而不问这种“扩大”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，那岂不是等于说，孔子变奴隶主官学为奴隶主私学，从而为奴隶主阶级培植更多的反动“人才”，也是他的“进步”，是他的“划时代的功绩”？！这是在超阶级观点的幌子下，替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子涂脂抹粉。可见，把屠杀革新派人士少正卯、镇压进步私学的反动学阀孔子，捧为中国“进步的大教育家”，这是对历史的颠倒！

以讲学为名的反动政治集团

过去，有的人还把孔子描绘成一个脱离政治的教育家，说因为“天下无道”，“乱臣当国”，“故孔子不仕，退而修诗书礼乐，弟子弥众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。孔子难道真是这么一个洁身自好，埋头讲学的“老教书匠”吗？这也完全歪曲了历史。

孔子一生都念念不忘当官“为政”，搞复辟。他常把自己比作“美玉”，“求善价而沽”；又说自己不是一个葫芦瓜，岂能光是挂在那里，只摆样子不能吃？他只要三个月没有做官，就惶惶不安。即使在他当不成官，无可奈何，只好去办私学的时候，也决不是要摆脱政治，而是把教育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。孔子自己就曾不打自招地说：“我用孝

梯教人，从而施加影响于当政者，也就是搞政治，何必亲自去当官？”（“《书》云：‘孝乎，惟孝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’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”《论语·为政》）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，孔子办学的目的是“施于有政”，把办学与“为政”结合，用教育进行反革命的政治活动。

孔子经常向学生们讲授如何谋求官职禄位，鼓吹“学也”，禄在其中矣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后来经由他的学生卜商（子夏）提出了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口号。这个口号是否仅仅是宣扬个人名利观念，鼓励学生升官发财呢？显然不是。

孔子有一个谬论，叫做“为政在人”。他认为政权的存亡兴衰，完全决定于有无几个“贤”人执政；其人存，则其政举；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”（《中庸》）他说：舜有贤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武王有贤臣九人，而后取得天下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所以“为政在人”，是说有了有“天才”的“贤人”，就能够“发扬光大”奴隶制之“道”，扭转他所谓的“世衰道微”的局面。子贡问他：“今之从政者何如？”他鄙屑地回答说：“唉！都是些卑微低贱的人，不足道！”（“噫！斗筭之人，何足算也！”《论语·子路》）于是，他就妄想通过办私学，培养一批他所理想的“学而优”的“志士仁人”，去“为政”，来维护奴隶主阶级专政。他以为这样，就可以阻挡历史前进，挽救奴隶制必然灭亡的命运。这完全是帝王将相决定历史命运的唯心史观，也是他鼓吹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政治目的。

孔子办的私学，实际上也是一个儒家反动政治集团。

孔子的讲学活动，是他反革命政治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。他率领弟子，游说诸侯，力图运用这个政治集团的声势，兜

售他炮制的儒家思想，制造复古倒退的舆论。《论语》这部孔子施教的言行录，实际上也是孔子施政的言行录，讲的内容大都是政治。直接回答国君、大夫、弟子们“问政”，以及议论如何“为政”、“从政”、“事君”、“使民”的条目，就有一百多条。孔子以讲学为名大搞反革命政治活动的行径，曾被他的学生子禽一语道破。子禽说，“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。

孔子办私学，也是“聚徒成党”，培植反革命党羽。孔子鼓吹君子“群而不党”，这是说谎。孔子杀少正卯，就是有党。他还积极干预和指挥学生从事政治活动。学生在当官之前或“从政”过程中，都得向他请示汇报如何“为政”。子路去当卫国蒲邑大夫，临行前孔子嘱咐他说：“蒲多壮士，又难治”，就教给他治人的权术（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）。当他发现新兴封建势力季氏违反周礼，私祭泰山，和季氏准备讨伐奴隶制小国颛臾时，他都立即要求在季氏那里做官的门徒设法加以阻止。他还多次亲自去巡视弟子们的“政绩”，凡是卖力执行他的反动路线的，孔子入其境就连声赞扬（《韩诗外传》卷六），若是背离了他的反动路线的，他就号召门徒“鸣鼓而攻之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。

有时，他还带领弟子一起去当官篡权。当他在鲁国做“司寇”的时候，他就趁机把他的门徒子路、冉耕、原宪、高柴、公西赤等人，分别安插在基层当官或出使外国，企图全面控制鲁国大政。他这种师徒结伙篡权的行径，引起了齐、楚等国统治者的警惕，以致后来孔子亡命楚国时，楚国大臣子西就劝阻楚王不用孔子，以防他带着一帮“贤弟子”在楚国“明周召之业”，搞夺权复辟的勾当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。

由此可见，孔子办私学，并非只是给学生们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，而是把它作为培植势力，攫取政治权力搞复辟的手段。孔子同学生的关系，也不是象他自称的：“你出十条干肉，我就教你读书”，只是买卖知识的关系，而是一个反动政治集团的首领同他的党徒的关系。关于这一点，当资产阶级思想家章太炎还在反对孔学的时候，就曾经指出：“大抵孔子乃春秋时一政客，其七十子之徒，不过其政党中之党员耳”。（金毓绂：《国学会听讲日记》）

培养奴隶主精神贵族的教育内容

孔子经常告诫他的学生，要做“君子儒”。什么是“君子儒”？就是死心塌地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。

孔子对“君子儒”的基本要求是：对自己，能用“礼”来修身养性；对奴隶主阶级，能充当一个“不辱君命”的帮凶；对奴隶和劳动人民，能有一套“使民服”的统治权术。可见，所谓“君子儒”，就是浸透了奴隶主阶级世界观，顽固地维护奴隶主阶级专政，专门“治人”的精神贵族。

为了培养“君子儒”，据《论语》记载，孔子对学生进行“四教”，即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的教育。这“四教”有一个总纲，就是“克己复礼”。

所谓“文”教，是以西周以来的诗、书、礼、乐等典籍为教材，灌输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，其中“礼”是最基本的。孔子反复强调“不学礼，无以立也”。这是因为，“礼”包括政治制度、道德规范等，全面地体现了奴隶制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。因此，孔子就紧紧抓住“礼”的教育，作为培养学生反动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中心环节。

“文”教的其他内容，都是为这个中心服务的。学“诗”（《诗经》），可以“思无邪”，不致“僭礼逾矩”，以便更好地“事父”、“事君”。读“书”（《尚书》），是要从历史文籍中领悟“先王”的“圣德”“明治”，以资效法。习“乐”（音乐），是为了陶冶奴隶主贵族的情操，并且往往是和等级森严的礼仪相配合，以加强“礼”的教育。

所谓“行”，是行其所知，即对于学来的“文”要身体力行。孔子提出君子要“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”。上述“文”教，即属于“博文”，但这还只是从书本上接受了“礼”的教育，而它的实际作用则在于付诸实行。所以，还必须以“礼”作为行为的准则，即“约之以礼”，也就是以“礼”为标准去“克己”。具体地说，就是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。

“四教”中的最后两项“忠”、“信”，是道德规范的教育，它同样是属于“礼”的范畴。所谓“忠”，就是“臣事君以忠”；所谓“信”，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欺骗奴隶们，使他们老老实实在地受奴役（“信则民任焉”《论语·尧曰》）。

以上分析说明，孔子教育内容的阶级性是很鲜明的。列宁曾经指出：“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，……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，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。”

（《青年团的任务》）孔子的所谓“四教”，都浸透了奴隶主贵族精神，它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：不要背叛奴隶制（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”

《论语·雍也》）孔子教育内容的阶级性决定了它的反动性和腐朽性，决定它的特点就是“颂古”、“学古”、“复古”。孔子曾经标榜自己是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，正是对他的

教育内容反动性的自供。

其次，孔子的教育是与生产劳动相脱离，与劳动人民根本对立的。当樊迟请教如何种田种菜时，孔子不但推开不理，而且大骂樊迟是“小人”。在孔子的眼里，剥削阶级是“高尚”的，而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和劳动人民则是卑贱的。他鼓吹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。

“君子”的任务就是致力于“治人”之道，劳动是奴隶们的事。君子只要学会礼、义、信等一套统治权术，奴隶们就会来归顺你，自己根本不必去种庄稼。在孔老二看来，“君子”去种田，有失奴隶主阶级的尊严，是违背“礼”的行为。

为了执行这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的路线，孔子还竭力宣扬奴隶主阶级的寄生哲学。他说，种田会饿肚子，读书则可以坐享奉禄（“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，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”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。用“馁”和“禄”施以威胁利诱，驱使门徒去“谋道不谋食”。在这种反动教育的熏陶下，孔门弟子也鼓吹生产技能是“小人”之道，“君子不为也”，否则，就会妨碍君子的“远大事业”（“子夏曰：‘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；致远恐泥，是以君子不为也。’”《论语·子张》）。孔子的这种剥削有理、读书高尚、劳动卑贱的谬论，后来被孟子发展为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也极力加以宣扬，形成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反动阶级偏见。

林彪和孔子是一条黑线

在阶级社会里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历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。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吹捧孔子为“至圣